

# 哲学大家金岳霖的逸闻趣事



晚年金岳霖

金岳霖字龙荪，生于1895年七夕，据其侄儿回忆，金父七夕之日从外骑马回家，途中遇到一条大蛇横在路中，金父便等蛇横过路后才策马而行。回家得知其夫人正要分娩，便决定：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就叫“巧巧”，若是男孩就取名“龙荪”。

少时，金岳霖对衣服很挑剔。他喜欢花衣，即一种上面有蟠龙、下面有海水江崖图案、前后左右都开衩的马蹄袖长袍。有一次母亲带金岳霖出门做客，让他穿着绿袍红马褂，金岳霖死活不肯，一向对母亲很顺从的他为此和母亲闹了一场。

金岳霖觉得清华学堂的伙食很糟糕，四大碗全是肉。一天，长沙雅礼中学的美国人胡美前来参观，胡美问金岳霖吃什么，他说：“不好，吃不来。”胡走后，金岳霖被时任学监的周贻春狠狠地批评了一通。

钱端升的夫人陈公蕙回忆，在美国留学时，一次金岳霖在回家途中遇到房东古德太太。房东太太发现金的脸色不是很好，便关切地问道：“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金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鹅湖边绕湖而走，这下吓坏了古德太太，以为他欲寻短见，忙紧跟其后，还找人帮忙，劝他千万不要想开。而金岳霖却为自己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赵元任和杨步伟在欧洲游玩，遇到了金岳霖。金向他们借钱，杨以为他生活困难，便借给他30元，并打算等自己的钱汇到后再借给他一些。谁知三天后，他们收到金从意大利寄来的信件，信中说，他想要三十元够到意大利去玩了，所以打算在那儿多玩几天。

1924年，金岳霖写信向国内的徐志摩借钱，说若再没钱，他就要跳河了。当时的徐志摩因为向林徽因求爱被拒而苦闷，他复信说：“不仅你在法国要跳河，我在国内都要跳海了……我们彼此都应互相祝贺，因为你没跳河，我也没跳海，我们都还活着。”

金岳霖曾与冯友兰、贺麟、瞿菊农、林宰平、沈有鼎等人一起办《哲学评论》，南京国民政府曾就此事要求他们回话。当时众人决定安排冯友兰为理事、贺麟为秘书，同南京方面的人打交道。而金岳霖的任务就是坐在沈有鼎旁边，阻止他发言。金虽不赞同他们的安排，但还是照办。时为考试院副院长长的陈大齐发言后，沈有鼎按捺不住，两三次准备站起来发言，都被金揪住了衣服，不让他说话。金岳霖晚年，在回忆文章中就此事向沈有鼎道歉。

但据任继愈回忆，金岳霖曾对他们说，沈有鼎第一次站起来想要发言时，被金拉住了，第二次，沈乘金不备，猛然站起，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通。但沈并没有讲他熟悉的逻辑，而是讲来新的哲学将是博大的三民主义唯心论大体系。

张爻若和金岳霖是好友，但有时也吵架。一次话不投机，争论起来，金说张真是 full of pride and prejudice (充满傲慢与偏见)，张马上反驳说，你才是 devoid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缺乏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是简·奥斯汀的两部著名小说。

20世纪30年代，金岳霖和朋友们到周六就在金家聚会，他们称之为“星六聚会”。“星六聚会”客人极多，五花八门，陈岱孙回忆，常客为学界中人，多为北大、清华、燕京的同人，也有金的学生们；学界中人也偶尔有外籍学人，如哈佛大学的校长坎南，由女儿和女婿费正清陪同来访；也有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士；陈还曾碰上过在戏剧界崭露头角的几位青年演员，遇到过几个玩蟋蟀的老头儿。

金岳霖曾这样描述他被称为“湖南饭店”的客厅：“一个光棍住在那样几间房子里，应该说是很舒服的。如果说是白天，那几间房子确实舒服。到了晚上，特别是上床后，问题就不同了。只要灯一灭，纸糊的顶棚上就好像万马奔腾起来，小耗子就开始它们的运动会了。好在那时睡我正当壮年，床上一倒，几分钟之后就睡着了。”

一次，金岳霖的侄儿金鼎汉去看望叔父，金岳霖对金鼎汉说，他很喜欢李清照的词，特别是《声声慢》。金鼎汉说：“我也很

喜欢这首词，但这首词里有一个矛盾。”金岳霖问：“什么矛盾？”金鼎汉问：“黄花是什么？”金岳霖回答：“黄花当然是菊花，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嘛！”金鼎汉又问：“乍暖还寒时候，是什么时候？”金岳霖说：“是春天，早春。”金鼎汉接着问：“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应该是早春吧？”金岳霖回答是。金鼎汉继续说：“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怎么又到秋天？”金岳霖一下被问住了，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得好好考虑考虑。”金鼎汉没在意，谁知回北大后，接连收到金岳霖的好几封信，和他讨论这个问题。最后金岳霖说，“乍暖还寒时候”肯定是春天，这一点毫无疑问，只能认为“黄花”不是菊花，而是早春时节的迎春花或连翘花。

杨步伟在昆明买火腿，店家让她用长铁针扎进去，拿出来闻闻气味好再买。一天，金岳霖和张爻若来访，杨步伟便告诉他们买火腿的方法，金听后极为兴奋，马上说：“我们这就去买。”三人到了店里，店家拿来一个火腿，他打一针进去闻闻，说再换一个，如此换了三四回，店家起了疑心，问道：“难道我们火腿都不好？”金解释说：“因为真好闻，我都想吃了，所以愿意多闻闻。”杨步伟和张爻若大笑不止，忙叫金不要再换了，杨步伟将金打过针的火腿都买了下来，店家煞是欢喜。

30年代，中国哲学会成立，金岳霖是核心人物之一，并担任哲学会的会计，一任就是十几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通货膨胀，金所管理的700多元经费变得不值几文，金还曾考虑，是否应该赔偿损失。

1952年，金岳霖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一文中，对学生殷海光和王浩进行了批判。在海峡彼岸的殷海光读到此文后，“思绪起伏不定”，但当有人撰文批评老师时，他立即撰文对其进行批判，他说这些人没有设身处地地为身在大陆的老师考虑。

陈修斋回忆，一次他和金岳霖在办公室闲聊，谈到了养鸡，金说，南方许多地方包括他的家乡湖南，每到春天小鸡开始成长时，就有人专门到各村各户为人阉鸡，公鸡阉了之后极易增肥，肉也好吃，但北方没有阉鸡。金当即就说要打个电话给副市长吴晗，让他抓一抓这件事情，可以首先在北京推广，改善北京人民的食物状况。

50年代，金岳霖、冯友兰、潘梓年三人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到莫斯科访问，由于三人都会俄语，点菜的能力都没有，所以连吃饭都要翻译陪同。一次，翻译外出，到吃饭的时间还没有回来，三个人只能干瞪眼。金岳霖在招待所走廊上，用英语和法语大叫：“能说俄文和英文的同志们请出来！”结果无人理睬，一直等到翻译回来他们才吃上饭。

昆明大观楼一副长联，上下联一共90字，一次，毛泽东问刚从昆明回来的谢富治：“长联还有吗？”谢说：“我回去给您抄回来。”毛答：“不必，我背得出。”金岳霖说：“大观楼的长联我也背得出来。”说完他便开始背诵，抑扬顿挫，声音朗朗。

1981年，已是86岁高寿的金岳霖身体每况愈下，但他每天还按规定的时间听新闻广播，看报纸。1981年春节，他大病一场，近乎瘫痪，可他却兴致勃勃地对学生刘培育说起收音机里听来的关于棉花产量增加的事情，并且自我安慰道：“这几天我能从沙发走到屋门了，又进了一步。看来短时间死不了，我要看到‘四化’。”

金岳霖是一位美食家，喜欢西餐，对中外各种菜的不同特点说得头头是道，能分辨出许多不同的甜，晚年他说自己最为欣赏的是“杂在别的东西里面的甜”。

金岳霖酷爱京剧，家中收藏许多名角的唱片，“文革”中，他的唱机被红卫兵当成“四旧”抄走，他便时常将唱片拿出来把玩。他说，看看唱片，仿佛就听到了声音。大家戏称金岳霖爱听“无声的唱片”。

罗常培一次对学生介绍金岳霖说：“金先生所读的西洋小说之多，不下于吴(宓)先生所读的中国小说。”可见金岳霖对小说的喜爱，他看过许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

尔摩斯，他都喜爱，据说他还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金岳霖喜欢清代张船山、黄仲则的诗作，到晚年还能背诵，他得知学生陈克明也喜欢二人的诗后，异常欢喜，问陈有没有二人的诗集，得知陈有后，当即让陈借给他阅读，并再三保证看完后归还。过了一段时间，金岳霖让厨师老汪还回诗集，几个月后，又托人借了回去。

邓以蘊(邓稼先之父)是大书法家邓完白之后，对中国画的鉴赏极有造诣。他常给朋友讲画，指着一幅作品说：“你看这一笔！”听者巴巴地等着他接下来的高论，谁知接下来他什么也不讲了，道理尽在不言中。而金岳霖颇能理解这种不言之教，也常学邓的姿势取乐。对于书画，金岳霖并不评论某一作品的真伪，而用喜欢不喜欢来代替。

金岳霖说：“我平时好大，却不喜功。”他喜欢摆几个大苹果在桌上，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观赏。抗战时期在昆明，他很喜欢当地的大枣子和铁皮大石榴，选几个大的摆在家中观赏。新中国成立后，金岳霖客厅靠墙的长案上，仍然放着一长列水果，季节不同颜色也各异：殷红发亮的大苹果，浅绿、白里透红的大水蜜桃，黄澄澄的大鸭梨……

李文宜回忆，金岳霖对苹果的热爱一时传为美谈，据说，他每星期必去王府井买个几个苹果，以供观赏。他的视力较差，出门时还常戴墨镜和半月形的遮阳帽，大家怕他坐平板三轮车途中出意外，劝他让别人代劳，但他却坚持亲自去买。

金岳霖去王府井买苹果，指明要特大的，还要记下分量，售货小姐知道他的爱好，总是帮他精心挑选。“文革”后，有人知道他的喜好，特地送给他漂亮的美国苹果(蛇果)。

金岳霖的侄孙女闵珊华回忆：“走进外公的房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大得出奇的水果，它们被当成工艺品，陈列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苹果、桃、橘子、梨都排着整齐的圆圈，层层向上收缩，而稳坐在中间最高点上的，自然是‘梨状元’了。这些水果姿态之奇，体型之大，真让人大开眼界。这些大号水果，他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送人。除了最得意的学生外，很难有人得到他的‘恩赐’。记得我小时候向他要大梨，他总是摸摸这个，拿拿那个，又看看我，要好几分钟时间，才能把一个‘探花’、‘榜眼’之类的梨赏给我，至于‘状元’，那可休想得他的‘恩赐’了。”

金岳霖的侄孙女闵珊华回忆：“走进外公的房间，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些大得出奇的水果，它们被当成工艺品，陈列在房间里最显眼的地方。苹果、桃、橘子、梨都排着整齐的圆圈，层层向上收缩，而稳坐在中间最高点上的，自然是‘梨状元’了。这些水果姿态之奇，体型之大，真让人大开眼界。这些大号水果，他自己舍不得吃，也舍不得送人。除了最得意的学生外，很难有人得到他的‘恩赐’。记得我小时候向他要大梨，他总是摸摸这个，拿拿那个，又看看我，要好几分钟时间，才能把一个‘探花’、‘榜眼’之类的梨赏给我，至于‘状元’，那可休想得他的‘恩赐’了。”

金岳霖最忌讳送礼，如果有人送了礼物，无论是谁，他都会声色俱厉地将他赶出门，不留一点情面。但有三种东西例外：年历、湖南菜和大梨。他最喜欢吃侄女金莹做的菜，每次金莹让女儿闵珊华送菜过去，他都高兴地到厨房老汪说：“老汪，莹妹子又送豆豉蒸肉来了，你给我收好，我要慢慢地吃！”

金岳霖喜好养鸡，其原因据说是林徽因曾送给他几只小鸡。沈性元回忆说，金岳霖曾养过一大群鸡，他常站在院中盯着活蹦乱跳的鸡群，久久不愿离去，有时则发出朗朗的笑声，或是弯腰不停地喂鸡。

金岳霖曾在庙会上买到一对黑狼山鸡，这是金第一次养鸡，他对这对鸡很是宝贝，养得极为尽心。在他的呵护下，公鸡长到九斤四两重，母鸡也超过了九斤。冬天来了，金岳霖觉得自己没有准备让它们过夜的房子，怕它们无法御寒，便按照书上所讲，用灌墨水笔的管子喂它们吃了一管子鱼肝油，结果鸡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有一天，杨步伟接到金岳霖的电话，说有要紧的事，让杨赶紧到家中一趟。杨问什么事，金不说，只是说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吃烤鸭。杨步伟是妇产科医生，以为是与金同居的秦丽莲怀孕了，说犯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金回答说大约不犯法吧。杨步伟和赵元任将信将疑地进了城。

到金家时，秦丽莲来开门，杨步伟死死地盯着她的肚子看。进门以后，杨才知道不是人而是鸡的事，金养了一只母鸡，三天了

一直鸡蛋生不出来。杨步伟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抓过鸡一看，原来金时常给它喂鱼肝油，以至鸡长到十八磅重，因而鸡蛋下不来，但是已有一半在外面，杨一掏就出来了。金岳霖见了，赞叹不已。事后，他们一起去烤鸭店吃烤鸭，以资庆祝。

在昆明时，金岳霖也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冲着脖子，和金岳霖在一个桌子吃饭，相处极为融洽。一到空袭警报响起时，别人都出城疏散，他却进城去抱他的大公鸡。

与梁思成夫妇同住昆明的龙头村时，金岳霖养过一只黄公鸡。这只公鸡异常骁勇，经常将别家的柴公鸡打得节节败退，是村中的霸王。但因此鸡太过嚣张，被人一棍子打死了。回到北京后，金岳霖又养了一只鸡，又因逞凶被人打死了。

钱耕森回忆：“金先生当时在自家的小花园中养了一只很大的洋种公鸡，体格健壮，色彩斑斓，精神抖擞，不时还边喔喔地啼着，边拍打着双腿，摆着一副好斗的架势，令人煞是喜欢多看它一眼呢！园子地上摆了不止少数的蟋蟀，屋内的窗台上、桌上和地下也摆了许多盆的蟋蟀，总计不下数十盆吧！那些蟋蟀都是红头黑身子，当它们振翅搏斗时竭力发出唧唧叫的喊杀声，此起彼伏，倒也蛮像演奏出一首奇妙的乐章呢！”

一次，金岳霖参加斗蟋蟀比赛，用一只九厘八的红牙黑打败了一分重的名星翅子。他认为斗蟋蟀可不只是娱乐，它还涉及高度的技术、艺术和科学。

金岳霖好抽烟，曾抽雪茄醉倒。他晚年回忆说：“从前是抽烟的。水烟抽过，不大喜欢，纸烟抽得最多，曾有瘾。好的抽惯了，贱的简直抽不得。斗烟我很喜欢，并且把烟斗作为艺术品来欣赏。烟味最好的是雪茄。在德国，我曾抽过一支巨大无比的雪茄，一次抽完，醉了。这个人从来乐观，唯一想‘自寻短见’或‘自了之’的时候，就是那一次烟醉的时候。”

陈克明回忆，金岳霖“治学谨严，知识渊博，不落俗套，不赶潮流，为人冲虚守正，生活极有规律”。他原烟吸，后发现吸烟有害健康，便改为每天抽三支，后减至一支。他将喝酒也改为每天一两，睡前以花生米等送下，既能安神，又能助眠。他坚持散步，每天傍晚雇一三轮车，坐至金岳霖胡同口，下车沿着王府井从北向南，再由南向北，散步半个小时，坐车回家。“文革”期间，为免遭非议，他将三轮改为排子车。晚年，他体力每况愈下，不便出门，便在室内走动，坚持走半个小时。

(来源：西北孤莲)

## 金岳霖简介

金岳霖(1895年7月14日-1984年10月19日)，祖籍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出生于湖南长沙。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著有《论道》、《逻辑》和《知识论》。

金岳霖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合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金岳霖走过的哲学之路及其创建的哲学体系，为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于《知识论》，金岳霖曾经说过：《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金岳霖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深入研究了逻辑哲学，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金先生认为，“各科学间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既为系统，就不能离开逻辑”。就是说，各门学问要系统化，都必须运用逻辑工具。哲学这个学问也不例外，如果要精确化和系统化，也必须完善和发展逻辑工具。金岳霖本人的哲学就以精密的逻辑分析见长，他的著作具有精深分析和严密论证的特色，形成一种独特的严谨学风。



## 竺可桢：大学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先生是我国著名气象学家，更是一位教育家。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十三年，建树卓著，今天向各位读者推荐的这篇文章，是1936年9月竺先生在浙大开学典礼上的非常著名的演讲，从中可见他平实而深刻的教育思想，以此缅怀：

诸位同学，学校开课已一周，今天训育处召集这个会，能和家人似的一起谈话，觉得非常愉快。

大学生，是人生最快乐的时期，没有直接的经济负担，没有谋生的问题。诸位在中学中，同学大都是同县或同省，可是，来大学后，有从全国各方面来的同学，可以知道全国的情形，时间长了，各人都认识。这样，各人家境的情况，故乡的风物，都能互相知道，这亦是一种教育。大学比之中学，在经费和设备方面，都来的充实，教师的经验和学识，也远胜于中学，这供给诸位切磋学问的极好机会。同时，国家花在诸位身上的钱，每年有一千五百元，而且，全中国大学生仅四万人，诸位都是这一万分之一的青年，这种机会，万万不能错过。

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英文称为College Spirit。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追溯到两学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有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诸位中间，一定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有的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做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美国大文豪罗威尔氏说：“大学的目的是，不在使生得到面包，而在使生所得的面包味道更好。”教育不仅使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中国古时有一人求神仙心切，遍走名山大川。吕纯阳发慈悲，知道他诚心，想送给他一点金钱宝贝，向他说道，我的指头能指石为金，或任何物件，你要什么我便给你什么。可是那个人并不不要金钱宝贝，而要他那只指头。这故事西洋也有的，英文所谓Wishing Ring，便是这个意思，想什么就可得什么。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他存在的理由，朱子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事而穷其理。要能即事而穷其理，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

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两三年以后诸位出去，在社会上做一些事业，无论工农商学，都须有清醒的头脑。专精一业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效。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的变成简单；
- 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
- 第三，以果敢的决心来执行。

这三点，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敢的决心，都应该在小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中国历来工商业的不振，科学的进步，都是由主持者没有清醒的头脑。瘟疫流行，水旱灾荒，连年叠见，仍旧还要靠拜神扶乩种种迷信方法。兴办事业，毫无计划，都是吃了头脑不清楚的亏。风水扶乩算命求神等之为迷信，不但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病，即我国古代明理之君子亦早深恶而痛绝之。

但到如今，大学毕业生和东西洋留学生中，受了环境的同化，而同流合污的不少。大的企业如久大公司、永利公司和商务印书馆的成功，要算例外了。近年来政府对社会所办的棉纺厂、面粉厂、硫酸厂、酒精厂和糖厂等，大多数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或是由于调查的时候不用科学方法。譬如办糖厂，应在事先调查在该厂附近地城产多少甘蔗，出产的糖精至何处，成本的多少，赢利的厚薄，与夫国外倾销竞争的状况。若事先不调查清楚，后来必至饮本倒闭。

这类事在中国司空见惯，如汉口的造纸厂，梧州的硫酸厂，真不胜枚举。还有失败的原因是用人行政重情而不重理，这就是没有公正的态度。用人不完全以才力为标准，而喜欢滥用人亲戚，每个机关，都应该多聘专家，计划决定以后，外界无论如何攻击，都得照着计划去做，这样才能成功。

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的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地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义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抱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若是对的，我们应竭力奉行。若是不对的我们应尽力排除。依违两可，明哲保身的态度和盲从是一样要避免的。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之头脑不可。

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便是，离开大学以后，将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观如何？有人认为是中国的人生观很受孔孟的影响，实际影响最大的还是老子。孔孟主张见义勇为，老子主张明哲保身；孔孟主张正是非，老子主张明福祸。孟子说：“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不是幸福哲学。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又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现在在中国一般人的最后目的还是幸福。我们羡慕人家说某人福气好，娶媳妇进门，即祝之曰“多福多寿多男子”。就是生子的最大目的，也就是想老年时候可以享福。中国普通人意想中的天堂，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一个世界，茶来张口，饭来伸手，这样幸福哲学影响于民生问题很大。

一般人以幸福为人生最大目的，中国民族必遭灭亡，历史上罗马之亡可为殷鉴。现在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如果一个民族还是一味以享受为目的，不肯以服务为目的，必归失败。我们应该以幸福为可耻，只有老弱残废才能享福，而以自食其力为光荣。英国国王在幼年时，必在军舰充当小兵，惟其如此方能知兵士的疾苦。全世界最富的人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Rockefeller)，他的儿子做事从小伙计做起，所以他们的事业能子孙相传不替。二十多年前，中国同时派学生留学欧美，中国的学生，一看见各类机械，便问从何处购买？何处最便宜？而日本的学生，只问如何制造？中国人只知道买，以享受为目的，而日本人则重做，以服务为目的；中国从前学工农的人，统是只叫工人农夫去推动机器，耕耘田亩，而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研究农业是不会进步的。中国古代轻视劳力，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样应该自己动手，这种人生观的改造，是极重要的。

以上所说的两点：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于享受。



1938年，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